WEMBA

四川

COAY Books

目录
Content

- 1 唐朝国号怎么来的?
- 2 唐朝皇帝为什么被称为“天可汗”?
- 3“东宫”之主究竟是娘娘还是太子?
- 4 唐代的“飞钱”是会飞的钱吗?
- 5 唐朝步兵靠什么对抗游牧骑兵?
- 6 我们现在常用的“格式”这个词是从哪里来的?
- 7“正经”最初是什么意思?
- 8 为什么唐代教数学的老师官品最低?
- 9 古代的“医生”是指行医的人吗?
- 10 中国古代有没有“大长今”那样的“医女”?
- 11 究竟是谁把纸送到了西方?
- 12“爆竹”何时变成了“鞭炮”?
- 13“唐三彩”真的只有三种色彩吗?
- 14 唐朝人为什么用香料来建造房子?
- 15“李白斗酒诗百篇”，但为什么说李白算不上海量呢?（
- 16 中国人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喝葡萄酒的呢?
- 17 盗版书最早从何时在市面上泛滥?
- 18 人类“文明之母”指的是什么东西?
- 19 世界上最早“量地球”的人是谁?
- 20“跳龙门”是哪个朝代的典故?
- 21 进士第一名为什么称作“状元”或“状头”?
- 22“连中三元”是哪“三元”?（1）
- 22“连中三元”是哪“三元”?（2）
- 24 唐代的秀才和进士哪一个更难考?

1 唐朝国号怎么来的?

李渊画像一国创制首先是要立国号，而立国号是件严肃的大事，必须有讲。那么，唐朝的国号是怎么来的？为什么号称“唐”呢?

有人会说，唐朝得号于爵位名，这确实没错。唐朝的开国之君李渊（566 635）是十六国时期西凉王李暠的后代。他的祖父李虎是北周的开国功臣，“八柱国”之一。据《旧唐书·高祖纪》载，李虎死后被“追封唐国公”，并由李渊的父亲李昞世袭其爵位。隋文帝开皇二年(582)李昞死去，李渊袭唐国公位。隋朝末年，李渊感到杨家大势已去，于是起兵太原，攻占长安，假意拥戴隋炀帝的孙子杨侑为傀儡皇帝，并授意杨侑将自己进封唐王。公元618年，隋炀帝被宇文化及缢杀于扬州，李渊便正式称帝，年号武德，定都长安，以唐为国号。

但是如果细究起来，李渊称“唐”还有一层更深的含义。“唐”最早是陶唐氏的简称。陶唐氏是远古时期一个部落的名称，居住在平阳一带（现今山西临汾），首领是尧，因此称为“唐尧”。周成王时灭了唐尧，封其弟叔虞，称为唐叔虞。叔虞传子燮父，改“唐”为“晋”，延用至今。后来不管“唐”及“唐国”有几处，其封地、辖境都在今山西境内。唐尧虽早在周朝已经灭亡，但文化的传承是有继承性的。比如“李”这个姓氏得于皋陶，皋陶是尧时执掌刑狱的“大理”，子孙相袭，代为理官，以官为姓，故称“理氏”。后来“理氏”子孙因避纣王之害逃到伊侯之墟，吃木子得以保全性命，遂改“理”为“李”。可见李姓与“唐”也有着密切的联系。就李渊而言，隋炀帝大业十二年(616)他出任太原留守，负责镇压山西一带的起义军。次年时机成熟，他就在太原起兵，而后据有天下。可以说，李氏起家于太原 这个古老的“唐”地。得到天下后，他命国号为“唐”，其实蕴含着深刻的纪念意义。（刘永连）

古代历朝是怎样选取国号的?

我国历史悠久，朝代繁多，各个朝代建立国号也出自不同的原因和理由。考查从夏至清十八个主要王朝，可见选取国号出于以下两种因素者居多：

一是得自地名。如夏最早居于夏地，殷商始祖契曾经受封于商而盘庚又迁于殷，周起于周原，辽因契丹先居于辽水，宋则建都于开封这个古称为“宋”的地区。不过这里面又分两种情况，一种是以部族起源、始祖起家之地为号，如夏、商、周、唐、辽等国；另一种是以国都所在地区为号，如殷、宋等国。

二是得自爵号。如刘邦自己曾被项羽封为汉王，故以汉为国号；曹丕则因父亲受汉献帝封为“魏公”、“魏王”而建国号“魏”。其他如吴、晋、隋、夏、明等也是这一类情况，而唐也内含这一类因素。不过这类因素里也分建国者继承先王名号和沿用自己爵号两种细节，前者有曹魏、晋、隋、明等，后者有西汉等。

此外，有些朝代以先前部族名号为国号，如夏，也有人说它源于大夏部落；秦，则奠基于秦部落的发展壮大。有些朝代则是继承了同姓、同地王朝的国号，如东汉、蜀汉以及后汉、北汉、南汉等刘姓王朝。非常有趣的是，刘渊本属匈奴，但也要沿袭刘汉正统，称国号“汉”。三国孙吴，因为其所居之地上古称“吴”，所以沿袭“吴”号。还有些王朝的国号另有特殊含义。如女真人完颜部称国号“金”，一是因为女真人的兴起地是“按出虎水”（今阿什河），意思为“金水”，其地多产金；二是因为金乃女真人的特产，相对于铁而言不变不坏，表达了阿骨打消灭辽朝的决心；三是因为女真人的金子色发白，符合他们崇尚白色的习俗，有利于统一族群。蒙古孛儿只斤氏建国号“元”，得之于《易》“大哉乾元，万物资始”的文义。而“明”字国号与国姓“朱”字相通，也受明教影响，寓意光明之世。女真人爱新觉罗氏原袭称“金”，后改国号“清”，则有以防金被火（明朝既称光明，以火为运）克，而要以水克火的谶纬之意。（刘永连）

2 唐朝皇帝为什么被称为“天可汗”？

太宗像可汗，又称大汗，亦可简称为汗，是古代北亚游牧民族柔然、突厥、吐谷浑、铁勒回纥、高昌回鹘、契丹、蒙古等民族对其最高首领的敬称。可汗作为一国之主的称号最早始于402年柔然首领社崙统一漠北自称。唐杜佑说，可汗“犹言皇帝”。唐朝太宗皇帝时，西北诸蕃尊称其为“天可汗”，以后对唐朝其他皇帝都沿用这一称呼。那么，唐朝皇帝为什么被称为“天可汗”呢？

据两《唐书·突厥传》记载，在唐朝建立初期，突厥趁中原国力不强，连年侵扰，掠夺人口和土地，甚至曾经长驱直入关中地区，迫使京都长安实行戒严。626年，唐太宗刚刚继位，东突厥颉利、突利二可汗又率兵十万直逼长安。后虽签订“便桥之盟”，但唐太宗认为突厥反复无常，决心彻底铲除，于是加紧军事训练，积极备战。629年，东突厥两可汗之间矛盾激化起来，突利可汗请求唐朝出兵援助，于是唐朝派大将李靖和李出兵讨伐，穿越阴山长途奔袭，直捣颉利可汗大营，一举击溃突厥主力，颉利也被俘获。经此一役，唐太宗把突厥从地图上抹去，大唐军功盛极一时，国威远播四方。

这个时候，北方各少数民族看到大唐帝国的威望，也慑于唐军势不可挡的兵势，于是在回纥酋长率领下前来长安，借大唐献俘庆典之际推戴唐太宗为各族共同的最高领袖。据《新唐书·突厥传》及《资治通鉴》、《唐会要》、《册府元龟》等史料记载，当时各族酋长纷纷上言曰：“愿得天至尊为奴等天可汗，子子孙孙愿为天可汗奴，死无所恨。”太宗当时问：我身为大唐天子，亦可行使可汗事乎？诸蕃君长异口同声表示肯定，并欢呼万岁，顶礼膜拜。同时，朝廷大臣们也对此表示肯定，当时议论说：“外俗以可汗为尊，不误 天子 二字含义。今称陛下为天可汗，令外俗知可汗以上，又有天可汗，自然益加畏服。”因而从此开始，唐朝皇帝针对边疆诸蕃行文，就用“皇帝天可汗”的称号。

各族首领拥戴唐朝皇帝为“天可汗”，意味着中原周边众多民族和外藩政权归属于大唐管理。它们与唐中央政权构成宗藩关系，平时战和必须听从唐朝皇帝调停和处置，并且有义务派兵跟随唐军征伐；各政权大小首领都被封为都督、刺史等官，可汗则多封为“归义王”之类的头衔；如果哪里有新可汗要当政，都必须经过唐朝皇帝允许和册封。太宗以后，唐朝国势继续发展，版图日益广阔，边疆各地政权乃至中亚昭武九姓、西亚波斯等国，都曾以“天可汗”尊称和侍奉唐朝皇帝。这样，“天可汗”作为唐朝皇帝的称号便沿袭下来。（刘永连）

藏族首领为什么称唐朝皇帝为舅舅?

唐玄宗时，藏王尺带珠丹上表说：“外甥是先皇帝舅宿亲，又蒙降金城公主，遂合同为一家，天下百姓普遍皆安乐。”藏王为什么自称为外甥，把唐朝皇帝称为舅舅呢？这就要从著名的文成公主入藏说起了。

唐蕃会盟碑

唐朝初期，在中国西南边境建立起了一个强大的奴隶制政权，其首领为松赞干布，首府设在拉萨。634年，为了同日益强大的唐朝建立起更亲密的关系，松赞干布遣使至唐，唐遣使回访，松赞干布请求联姻。唐太宗接受他的请求，将宗室女文成公主嫁给他。文成公主出嫁西藏，是一件十分重大的事。唐太宗十分重视，他不仅给文成公主准备了丰富的嫁妆，而且准备了各种诗集、经史，还有生产上的技术书，上百种医药书，天文历法等书籍以及各种作物种子。除此之外，还带了许多掌握各种技术的工匠和一个乐队。吐蕃王松赞干布，为了迎接文成公主的到来，特地命人仿照唐朝的建筑，修了一座宫殿 大昭寺。至今在布达拉宫里面还有松赞干布与文成公主的塑像，以及他们结婚时的洞房遗址。唐高宗即位后，封松赞干布为“驸马都尉”、“西海郡王”。以后历代藏王多自认为唐朝皇帝的外甥，尊称唐朝皇帝为舅舅。（徐乐帅）

3“东宫”之主究竟是娘娘还是太子?

“东宫”一词经常出现在小说戏剧里，并且往往与娘娘联系在一起，动辄就说“东宫娘娘”、“西宫娘娘”。

但从历代正史资料来看，“东宫”向来是太子所居之地，有时也指太子，与所谓娘娘并无任何联系。例如，唐初发生内部矛盾，分成了东宫和齐王府势力组成的政治集团，号称“宫府集团”，其中所谓东宫就是指太子李建成。那么，为什么太子及其所居之处号称“东宫”呢?

唐长安城平面图

据《唐两京城坊考》描述，宫廷分为三个部分：中间主体部分称“太极宫”，其前半部分是皇帝处理政务的场所，后半部分是皇帝及后妃生活起居之处；太极宫左右各有一块狭长城区拱卫，西部城区称“掖庭宫”，多居宦官杂役，并设太仓；东部城区即称“东宫”，是太子日常起居的地方。这种居住习惯早在秦汉以前就已经确立了。《诗经·卫风·硕人》：“东宫之妹，邢侯之姨。”毛亨传：“东宫，齐太子也。”孔颖达疏：“太子居东宫，因以东宫表太子。”因此有时候就称太子为东宫。太子府的属官就称为东宫官。

但史料中也有其他说法。《春秋公羊传》僖公二十年载：“西宫者何？小寝也。小寝则曷为谓之西宫？有西宫则有东宫矣。鲁子曰：以有西宫，亦知诸侯之有三宫也。”注：“夫人居中宫，少在前，右媵居西宫，左媵居东宫，少在后。”此处之媵，指妾，即王侯之嫔妃。在夏、商、周三代，各个诸侯都有妻有妾。按照礼制，他们的正房夫人居住在中宫，位置较为靠前，右媵住在西面，其住的地方称为西宫，左媵也住西面，只是位置稍微靠后，但她住的地方就被叫做东宫。再据《汉书·刘向传》云：“依东宫之尊，假甥舅之亲，以为威重。”其注云：“师古曰：东宫，太后所居也。”在汉代时，太后住在长乐宫，长乐宫位于未央宫的东面，因而又称太后为东宫。但这也是很罕见的事情，在各个朝代并不都这样称呼太后。戏剧里面“东宫娘娘”就是指皇

帝的左右贵妃，以上诸说与此有些类似，很可能就是这种说法的史料依据。（刘永连）

唐朝宫廷的饮食起居

在唐代，皇帝制度达到成熟，宫廷之中的饮食起居都有成套礼仪和规矩。

宫中有专门掌管御膳的机构尚食局，属殿中省，设置奉御、直长、主食、主膳和食医等官，由宦官担任。作为技术官主食有16人，而主膳多达840人。同时后宫宫闱中还专设尚食、司膳、典膳、掌膳等官。他们负责日常把饭菜食品从采购食料到灶台炒制，再到分别食类，向各殿分发等各项工作，一定要把饮食准时、安全地送到皇帝和后妃们的眼前。宫中非常讲究饮食的丰富、新鲜、卫生及养生作用，不但天下山珍海味可以随时供应，而且食医门会根据气候节令搭配食谱，调配各种合适的食品出来。

平时皇帝居住在太极宫，这里位居宫城正中，外侧有郭城从东、南、西三面环抱，犹如众星拱月，衬托出皇帝高高在上、与众不同的地位。太极宫中的太极殿是皇帝处理日常政务的场所；稍北有两仪殿是皇帝休息和接见大臣的地方；向南正对宫城正南一门承天门，门前横街宽广，是一个开阔的广场，可以聚集万人之众，因而就成为皇帝举行朝贺、庆典和接见外使、百姓的地点。宫城后半部分称作寝宫，是皇帝日常娱乐、寝宿之处。内设诸多宫院，各居后妃以服侍皇帝。该处管理最严，侍卫守护，黄门监督，臣民不得无故入内，即使百官应召入宫也要详细记录下其姓名、官爵、年貌等，并验证牌符，以防假冒。寝宫往后出玄武门是皇家禁苑，这里可不像北京故宫里的御花园那么狭小，而是绵延百里，极尽山水园林之美，是皇帝和后妃们休闲娱乐的洞天福地。（刘永连）

4 唐代的“飞钱”是会飞的钱吗?

“飞钱”虽然不会飞，但是这个名称非常生动形象，因为这个“钱”不需携带就可从一地到另一地。“飞钱”是中国早期的汇兑业务形式，又叫做“便换”，它最早出现在唐宪宗元和初年。

唐代的经济繁荣，尤其是商业兴盛，除了国内南北方的商业交流日益增加，对外贸易也日渐增多。许多国家与唐朝密切通商，其国内也流通“开元通宝”，唐朝官府与民间也经常以铜钱购买外国货物。这样一来，一方面随着对外贸易的发展，铜钱大量外流，各地经常出现“钱荒”，于是规定各地方政府禁止钱出境，以防止铜钱流入海外；另一方面，商品交易量的增加也使商人带上大量铜钱外出经商有很多不便之处。在这种背景下，就出现了中国汇兑业务的雏形 “飞钱”。

商人们先在京城把钱交给诸军、诸使、富家或诸道进奏院，开具一张凭证，上面记载着地方和钱币的数目，然后商人携带凭证到其他地区的指定地方取钱，这个凭证就是“飞钱”。飞钱盛行于长安以及扬州、广州、成都之间，反映了商业繁荣的一个侧面，同时促使唐代的货币经济及货币流通手段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飞钱”有官办和私办两种形式，一种是官办，设于京城的“进奏院”，各地在京城的商人，把钱款交给各道驻京的进奏院，由进奏院开具发联单式的“文牒”或“公据”，一联交给商人，一联寄往本道。商人与节度使派遣在京的进奏院交涉完后，就可以以一纸凭据随时随地兑换现金。另一种是私办，由一些大商人利用总店与设在各地分店之间的联系，向不便携款远行的商人发放票据，商人可凭此票据在私商所开的联号取兑货款。

敦煌壁画《胡商遇盗图》

“飞钱”的出现一方面减低了铜钱的需求，缓和了钱币的不足，同时也给商人们在全国各地进行贸易活动时带来了极大的方便。但是“飞钱”本身不介入流通，不行使货币的职能，它只是一种汇兑业务，不是

真正意义上的纸币，北宋时期四川成都的“交子”才是真正纸币的开始。

“飞钱”这种汇兑方式被北宋沿用。宋开宝三年（971），官府在开封设置官营汇兑的机构“便钱务”，为行商直接办理异地汇款。（李晓敏）

为什么说古代金融业真正形成在唐代?

中国历史上最早的金融机构就是典当行，也就是常说的当铺。“先有典当，后有票号，再有钱庄”，这是对中国旧时代金融业发展过程的清晰描述。

著名历史学家范文澜先生曾指出：“后世典当业，从南朝佛寺开始。”当铺产生于公元4世纪的南北朝时期，距今已有一千六百余年的历史了。当铺最早出现在佛教寺院，南朝宋时的江陵令甄法崇的孙子甄彬，曾经到当地长沙寺的寺库中质钱，这里的寺库可能就是寺院经营的专门当铺，但也可能是寺院普通仓库而兼营典当。《南齐书》中也有：“渊薨，澄以钱万一千，就招提寺赎太祖所赐渊白貂坐褥，坏作裘及缨，又赎渊介帻犀导及渊常所乘黄牛。”服装以及生活用品甚至黄牛都可以当作抵押品到寺院中去借款，可见当时的佛寺已经兼营典当或有专门的典当机构。随着南朝佛寺典当经营活动的兴起和普及，典当业逐渐形成。

不过南北朝时期的典当业还仅仅是属于寺院经济的一个组成部分，处于萌芽阶段。直到唐代，中国典当业才真正跳出佛寺这个狭小的圈子，成为整个社会十分常见的蓬勃发展的金融业。唐代典当行业普及全社会，民间当铺也称为“质库”。《唐六典》中已对典当利率作出了规定。

宋代，典当已成为正式行业。京师汴梁的当铺已被列入“士农工商诸行百户”之内。南宋时，典当业更为发达，仅京都临安一地，城内城外的质库也就是当铺不下数十处，每天的交易量也十分惊人，“收解以千万计”。（李晓敏）

5 唐朝步兵靠什么对抗游牧骑兵?

在农耕民族建立的中原王朝与边疆的游牧民族政权发生战争时，尽管中原军队往往占有人数上的巨大优势，却往往在战争中处于劣势。原因无他，中原军队往往以步兵为主，对阵以骑兵为主的游牧民族军队，在军队的机动性、冲击性等方面有着天然的劣势，这种劣势往往是靠人数优势难以弥补的。而唐王朝在前期的对游牧民族的战争中却能够屡屡取得胜利，除了唐王朝本身也有一支强大的骑兵外，还因为当时拥有步兵对抗骑兵的利器 陌刀。

陌刀是唐朝特有的兵器，长击短接皆可适用，刀形似剑，双开刃，前锋略宽，连柄可长一丈，重15斤，兼有近战刀和枪的功能，为古代特有的斩马剑。陌刀是作为军队重要的战争物资装备的，严禁民间私造和私藏。

唐代陌刀

陌刀兵号称唐朝最富攻击性的独特兵种，但因其要求的苛刻和挑剔，训练和配备一个陌刀兵的成本和周期，不会比一名骑兵少，以唐朝举国之力，也只在天下四大都护府之一安西大都护府，才有军级的编制。唐军中的步兵的陌刀如墙推进战术，创造了盛唐时期辉煌的战争历史，也创造了陌刀的神话，特别是在对抗安息、大食等国的那些轻甲甚至无甲的沙漠轻骑兵的战斗中有特效，一刀斩去，基本是人断马断的。陌刀军的参战，在任何可查询的战例中都是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陌刀军作为战斗序列中单独的作战力量在唐军的征战中立下了汗马功劳。陌刀是汉民族与善骑射的游牧族战争中改变自己马少不精的劣势、发挥步兵多优势的关键兵器。但由于使用陌刀的成本过高，到了积贫积弱的宋代陌刀就退出了战争的舞台。（徐乐帅）

唐王朝靠什么很快灭掉了当时强大的东突厥?

贴金铠甲骑马俑(懿德太子墓出土)唐王朝之所以能够在立国之后很短的时间内就灭掉了当时亚洲大陆上的霸主东突厥，在很大程度上

是因为唐人向突厥人学习，用轻骑兵取代重骑兵的结果。

中国古代自十六国至隋代，一直以“甲骑具装”即人马都披铠甲的重骑兵为军队的主力，至唐初却一变为以人披铠甲、马不披甲的轻骑兵为主力。这是因为自十六国至隋代，当时的战争往往是中原诸政权之间的战争，步兵往往是战场上的主力，而防护力强、机动力差的重骑兵是对付步兵的利器。到了唐代，随着中国再度完成统一，战争开始转化为唐王朝与周边诸游牧民族的战争，而重装骑兵在对付游牧民族的轻骑兵过程中其机动性差的缺陷充分暴露，随着战争实践的发展，尤其是与突厥等游牧民族的战争，人们逐渐认识到对骑兵来说，机动性比防护力更重要。隋唐之际，在军事思想方面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重视机动的思想代替了重视防护的思想。唐初名将李靖强调指出，“战贵其速”。

由于战争实践需要轻骑兵充当战场上的主力，唐朝军队开始以轻骑兵代替甲骑具装作为军队机动力量的主力。起初是增加了军队中轻骑兵的比例，减少了具装骑兵，后来逐渐以轻骑兵基本取代了具装骑兵。唐初轻骑兵在编成、装备、训练、战略、战术等方面都深受突厥的影响。唐高祖李渊早在太原起兵之前，就曾全面模仿突厥轻骑兵的模式，训练其军队，并收到了很好的效果。李渊认为轻骑兵“见利即前，知难便走，风驰电卷，不恒其阵”，行动迅速是突厥骑兵经常取胜的重要原因，而中原军队的特点恰恰与之相反，于是“简使能骑射者二千余人”，以突厥的方式加以训练，“饮食居止，一同突厥”。“突厥每见帝兵，咸谓以其所为，疑其部落”。后与突厥交战，“纵兵击而大破之”，致使“突厥丧胆，深服帝之能兵，收其所部，不敢南入”。此后，精锐的轻骑兵在唐王朝平定天下的过程中发挥了重大作用，如李世民本人就是一个非常善于带领轻骑兵作战的将领。李靖等人在击灭东突厥等的战争中也充分发挥了轻骑兵的威力。实际上，李靖灭东突厥的决定性之战就是利用三千轻骑突袭突厥可汗大帐，活捉了东突厥的最

高统治者颉利可汗，从而使得东突厥灭亡，这也算得上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了。（徐乐帅）

6 我们现在常用的“格式”这个词是从哪里来的?

今天的“格式”一词指的是写文章等的一定的规格样式，在唐代的时候这个词是两个字分开用的，是法律专用名词。唐代将法律文书区分为律、令、格、式四类。《唐六典》中有“律以正刑定罪，令以设范立制，格以禁违止邪，式以轨物程事”。可知律是判罪量刑的依据，也就是今天的刑法，而令则是关于各种规章制度的规定，类似今天的行政法规。“令”有二十七种，如官品、三师三公台省职员、寺监职员、卫府职员、东宫王府职员，以及祠、户、选举、考课、宫卫、军防、衣服、仪制、卤簿、公式、 丧葬、杂令，共1546条。格、式是对律、令的补充，格规定了文武百官的职责范围，是用来防止奸邪的禁令，有七卷二十四篇。式是尚书各部和诸寺、监、十六卫的工作章程细则，有二十卷三十三篇。四者互有区别而又互相联系，构成隋唐以后中国封建社会完整的法典体系。

唐律残片唐前期以修定律令格式作为立法活动的主要内容。到了唐后期，“编敕”成了立法活动的主要内容，成为根据形势需要调整法律的主要形式。唐后期的法制，既是唐前期法制的继续，又非前期法制的照搬。在唐后期，敕的地位日益重要，它不仅跻身正式法典，而且法律效力和适用范围也远远超过律、令、格、式，而后者则大多成为具文。

律、令、格、式并行的制度被五代以及宋朝所沿袭。后晋、后周都有关于制敕的编集，称为编敕，与格、式并用。到宋代，有敕、令、格、式的区别，而且敕的地位还重于令，这是既有沿袭又略有演变。至于刑律，则自宋、元以至于明、清，基本上以唐律为蓝本。律、令、格、式的法典体系还广泛地影响了东亚各国，朝鲜、越南、日本都接受了这种体系，尤以日本受到的影响最为明显。

我们看到，律令格式中，前两者更加接近于今天社会中的法律的内容，而格和式规定的则是官员以及政府各部门的行政职责，也就是

一种工作规范，换句话说，前两者告诉人们什么是不应该做的，而后两者告诉人们应该按照什么样的规范去做，所以由于这个含义而逐步地演化成为我们今天的“格式”。（李晓敏）

为什么说唐朝是中国古代法律的最高峰?

唐太宗时颁布了《唐律》即《贞观律》，唐高宗时又有《永徽律》，永徽三年（652），唐高宗命长孙无忌领衔对《永徽律》的精神实质和500条律文逐条逐句进行注释，疏证解释，以阐明律条文义，并通过问答形式，分析律文的内涵，说明其中的疑义，并把这些附在律文之后，称作疏议，撰成《律疏》三十卷。《律疏》与《律》合为一体，统称为《永徽律疏》，宋元时称作《故唐律疏议》，明末清初开始叫作《唐律疏议》。

《唐律疏议》是中国历史上保存至今的最具影响力的封建法典，也是一部完整的、综合性的封建法典，它将法律条文与对条文的解释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反映了唐代律学的统一和发达。《律》和《疏》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力，“自是断狱者皆引疏分析之”。此后律文在没有什么大的改动，以后各代大多修改编纂的是“令”和“格”、“式”。可以说，中国古代法律在这时已经基本定型了。

《唐律疏议》从结构上包含律文和相应的法律解释两部分，内容清晰且便于适用；唐律的条文涵盖广泛，疏而不漏，全面维护着唐朝封建统治秩序的稳定。它的基本特征就是对唐律律文进行周密、系统、完整的解释，即“疏议”部分，这部分是中国古代律学之精华的体现。律文的解释丰富了律文的内容及其法理的色彩，建立起了一个律学的体系，从而使中国古代的律学达到了最高的水平，成为中国乃至世界封建法律的最高成就。唐代对律文的疏解是古代社会解律经验的集中体现，对律文的各种解释基本上都包括在这一部刑律之内，成为后世法律的典范。（李晓敏）

7“正经”最初是什么意思?

“正经”是我们经常挂在嘴边的一个词汇。如果说某某是个正经人，就是评价他为人正派；如果说某人做的是正经事，那么这种事情肯定是正当合法的；如果说某人正正经经地做事情，那是说其人其事名副其实，绝不掺假；如果说我现在正经八百地来了、说了、做了，那就是说我是很严肃的。然而，“正经”一词最初与以上意思都不沾边，而是另有来历。

开成石经(局部)“正经”最早是一个教育制度用语，起源于唐代中央官学的教学内容，与当时的学校教育密切相关。唐代教育发达，有官学和私学两大体系。官学又分中央官学和地方府、州、县、乡和里学。无论官学和私学，除了中央官学中的律学、书学、算学、医学等几个专门性学校和乡村基层里学外，其他学校都以儒家经典为主要教学内容。就其师资力量和教学制度而言，尤以国子学、太学、四门学以及弘文馆、崇文馆最为正规。在这些学校里，有博士、助教、直讲等各级教师授课，而且各有擅长，专业学术水平极高。同时设立课程上，又将所有的儒家经书分门别类，设立不同专业来研修。总的来讲，学生可以学习的儒家经典先有正经与旁经的区别，正经分三类共九种，旁经则分二种。这里所谓“正经”，是指主体课程，尽管不要求全部精通，允许选修，但是必须至少精通部分，否则无法合格毕业。研修正经又可细分三种情况：《礼记》、《春秋左氏传》为大经，学制为三年；《诗》、《周礼》、《仪礼》为中经，学制为二年；《易》、《尚书》、《春秋公羊传》、《谷梁传》则被称为小经，学制为一年半。学校对正经的研修非常重视，而其研修难度和水平要求也非旁经所能比。特别是大经，能通一经已属不易，如能通二经，则就是杰出人才，如果企求大、中、小全通，则是完全不可能的。因为即使是“五经博士”也都是自专一门的，千古以来还未有能全通正经的大师。

与“正经”相对是“旁经”，分为《孝经》和《论语》两种，学制为一年。虽然两种必须都学，但只是辅助性的课程，其重要性远远不及“正经”。（刘永连）

唐代学校只教授儒家经典吗?

在我国古代，儒家经典往往是各种学校的主要教授内容，尤其是在科举时代，由于考试内容的限制，使得无数的学子皓首穷经，埋头于以四书五经为代表的儒家经典中，但在科举制刚刚兴起的唐代，情况并不是这样。虽然这时的儒家经典也是各级学校教授的主要内容，但不是全部。唐代的官学设置比较完善，在中央设置六学，即国子学、太学、四门学、书学、算学、律学六学，都归国子监统领。其中前三学国子学、太学、四门学，教授儒学经典，只不过是各学招收的学生身份各有不同。而另外三学则类似于专门学校，教授相关的专门知识。就以其中的算学为例，当时设算学博士，算学学生必须修习《九章》、《海岛》、《孙子》、《五曹》、《张邱建》、《夏侯阳》、《周髀》等算经，学生年底要进行考核，尤为重要的是当时科举中设立“明算科”，学生可以由此出身。另外律学传授法律知识，培养专门的法律人才，书学专门培养书法家和书法理论家，律学学生和书学学生同样可以通过不同的科举科目出身。不过虽然书学、律学与算学也为唐王朝培养了不少人才，但这三学与专门传授儒家经典的国子学、太学、四门学在规模、地位等各方面都没法比。例如在人数方面，国子学学生300人，太学学生500人，四门学生1300人，而律学、书学、算学生分别仅有50人；学生在以后的仕途上更是没法比，律学、书学和算学出身者几乎没有身至高位者。（徐乐帅）

8 为什么唐代教数学的老师官品最低?

唐朝为了在全国选拔数学人才，在科举考试中首创明算科，考试只考数学一科。只要考试“得中”，便可直接授予官职。这一举措对数学教学推动极大，大大调动了人们学习数学的积极性。显庆元年（656)唐朝在国子监开办了数学专科学校 “算学馆”，设算学博士和算学助教主持日常数学教学工作。这样国子监内就有了国子、太学、四门、律学、书学、算学六个学馆。唐朝政府明令《算经十书》作为专门的数学教科书。各地方还有完备的官学和名目繁多的私学、家学、经学兼授、僧道传授等数学教学形式，这些做法有力地推动了唐代数学教学的发展。

唐代采用了全国统考的方式，设计了命题形式、命题范围、评分标准、录取办法等一整套考试规定，这在当时世界上是没有先例的。教师在数学教学中，多从生活实际和生活经验出发，结合具体数学问题进行讲解，使学生容易理解和掌握。这就是今天说的“理论结合实际”。但实际上这也导致了中国古代数学更多流于实际操作而缺失理论的总结和突破，不可能发展成为一门真正的现代科学。

当时著名的数学家有李淳风、僧一行等。李淳风编订了十部算经，作为国子监的教材，这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数学教材，还撰写过《九章算经要诀》一卷，公元644年编成《甲子元历》，对后世天文、历法和数学的发展贡献很大。

唐代最著名的数学家、天文学家僧一行把数学与天文学结合起来，创造了世界上最早的不等间距二次内插法公式；他组织并领导的在全国十二个点对北极高度和日影长短的测量，是世界上第一次对子午线的实测。

唐代的数学的确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在国子监中设立“算学”就是5世纪以后数学获得高度发展的反映。但是当时的数学教学仍然是不受重视的。如国子博士的官阶是正五品上，但其中算学博士的官阶却是

从九品下，是官阶中最低的一级。科举考试中明算科及第的出身很差，应试的人很少，到晚唐时期，明算科考试就停止了。

中国古代数学教育的特点是没有形成一个独立的学科，始终置于政府的控制之下，数学典籍的编纂、增修和注释一般是在政府官员的主持下进行的。官办数学教育的目的是为政府培养专业计算人员。这种实施数学教育的做法，在世界史上是少见的。（李晓敏）

我国什么时候开始有了专门的数学教材?

中国是数学教育开始最早的国家，西周时期以五礼、六乐、五射、五御、六书、九数等六艺作为教育的基本内容。数学已成为贵族子弟教育的必修课程之一(“九数”即方田、粟米、衰分、少广、商功、均输、盈不足、方程、勾股)。可见我国数学教育至少开始于三千多年以前。

中国古代的数学著作似乎都可以作为数学教材，因为大多数著作的出发点是指导实践，首先考虑的是如何便于教给人们掌握，所以较为注重由浅入深，举一反三。但最早的专门的数学教材出现在唐代。

唐代的数学教育有了很大进步，在当时的最高学府国子监设立了专门的算学馆。唐高宗时的太史令李淳风受诏与国子监算学博士梁述、太学助教王真儒等校注和编定《周髀》、《九章》等十部算经，也叫《算经十书》。书完成后，定出学习年限，安排每月考试，被颁布用于国子监的教材，同时也是科举考试所依据的经典。这应该就是中国最早的数学教材了。这是公元656年以前的事，现在有传本的《算经十书》每卷的第1页上都题：“唐谏议大夫、行太史令、上轻车都尉臣李淳风等奉效法释。”

唐代的数学向外传播到朝鲜、日本、印度等地。这部最早的数学教材也随之流传到了日本和朝鲜。朝鲜日本的“遣唐使”中有些是专门来学习中国历法和数学的。日本在公元701 703年开始确立了类似我国的数学教育制度。朝鲜在公元918 1392年仿照我国设立学校的算学

馆，不仅采用唐、宋编定的《算经十书》作教材，连教授和考试的方法也相同。（李晓敏）

9 古代的“医生”是指行医的人吗?

现在，我们把专门治病救人的人称作“医生”。如果从字面讲，看似不难理解，说成“以行医为生计或职业的人”也不矛盾。但是，如果从文化发展的角度看，远非这么简单。

我国医学行业的发展有着其特殊的经历。从现在往回看，“医生”普遍用于称呼行医的人并不是很久。以前人们习惯称呼行医的人为“郎中”，也习惯称之为“大夫”。这些称谓来自古代行医者所任的官职名称。大致从宋代起，太医署中的医师最高职衔为大夫，其次为郎中。如果再往上溯，大夫是朝中某些大臣的官名（如御史大夫）和散位名号（如光禄大夫），郎中是三省六部里面的郎官们的名号，它们则都与行医者没有任何关系了。从唐代往前，医术往往为宗教界的道士、僧侣或方士们所掌握，他们在传教的同时兼行治病救人的善举。而行医者在朝廷尚有医官，在民间则还没有职业行医的人。

孙思邈诊脉图

不过，“医生”作为一种称谓倒是早在唐朝就已经有了，而且与医学、医术有联系。唐代太医署下开始设立专门的医学，属于学校性质的教育机构，招收学生，培养医学人才。针对不同的专业，学校将学生分为五种：医生、针生、按摩生、咒禁生、药园生。其中所谓“医生”，其实就是学习医学病理的学生。而其他学生分别以学习针灸、按摩推拿、念咒施法、识用药材而命名。这时候“医生”一词专指一种医学学生，与现在的医生有很大距离。

那么，“医生”是怎么成为职业行医者的称谓的呢？这与近代西医东传有直接的关系。在西方，对职业行医者一般称为“Physician”，可以理解为“有医科专长的人”，或称“医师”。西医东传以后，日本从明治维新后称职业行医者为“医师先生”。在中国，渐渐演化为“医生”。这其实与“博士”、“学士”在学位上的用法来历类似，是采用中国古代

早已存在的相关名词，拿来称谓西方传来的新的文化内容。（刘永连）

唐代学校是怎么进行医学教育的?

中国医学在唐代比较突出的发展之一，就是开办了中国历史上最早的专门进行医学教育的学校。武德年间（618 626），首先在京城长安创办了直接隶属太医署的“医学”，相当于现在国家直属的医科大学；贞观三年（629）起又开始在各州府陆续创办地方医学，相当于现在地方医学院之类的学校。

在唐代“医学”学校里，专业分类已很正规，初分医学和药学两大体系，医学体系中又分医、针、按摩、咒禁等四科。而医科又分为：体疗科，相当于今天的内科；疮肿科，相当于今天的外科；少小科，相当于今天的儿科；耳目口齿科，相当于今天的五官科；角法科，相当于今天的针灸科，包括拔火罐等。医科学生首先要学习《素问》、《神农本草经》、《针灸甲乙经》等基础课程，然后分科学习，学制三至七年不等，并安排临床实习。至于针科，专门学习穴位针理和针灸方法；按摩科，专门学习血脉经络和按摩推拿；咒禁科，则专门学习如何念咒施法，召唤魂魄。这不奇怪，因为在古代医术与巫术向来是密不可分的。虽然这些名称的含义与今天不尽相同，但其教学安排还是和我们现在的高校教育有相通之处的。

唐代的医学教育已经有了比较完备的管理制度。在师资配备上，据《新唐书》记载，医学校里各科都配备有博士、助教、师、工等教职员工。在选拔人才上，首次在科举考试中设立医科，主要从医学里选拔成熟和杰出医术人才来做官。（刘永连）

10 中国古代有没有“大长今”那样的“医女”?

新近发现的天一阁藏明抄本宋《天圣令》，其中《医疾令》篇保存了一条规定女医教育的唐令条文“女医”条：“诸女医，取官户婢年二十以上三十以下、无夫及无男女、性识慧了者五十人，别所安置，内给事四人，并监门守当。医博士教以安胎产难及疮肿、伤折、针灸之法，皆按文口授。每季女医之内业成者试之，年终医监、正试。限五年成。”这条资料表明，在唐代，已经出现了专门培养女医的教育机构。

从这条记载来看，唐代的女医地位还是比较低的。首先从出身来看，她们是从地位卑贱的官户婢中选取；其次在学习过程中还要被宦官严密看守；再者在学习过程中主要学习安胎产难，兼及疮肿、伤折、针灸之法。而且教习的方式是“按文口授”，这就注定她们即使是毕业后，也是所学有限，只能在医疗过程中起一个辅助角色，地位并不会有大的提高，何况当时医生地位本身就不高。另外，女医的学制是“五年”。在学习期间，女医要进行季试和年终试。季试由学业有成的女医主掌，年终试由医监、医正主掌，所试应该主要是实践能力。她们学业有成之后应当是主要为后宫的嫔妃和宫女服务的。

从现在的史料来看，女医教育，应是在隋唐年间才出现，而且很可能是唐代的创设，是医学教育走向具体化和完善化过程中的产物。而这个产物，从唐《医疾令》的“女医”条令文来看，似乎尚未正规化，其正规化要到宋代才完成。(徐乐帅)

唐代曾经出现了唯一的女皇帝，那么其他女性能不能做官?

清人绘武则天像

唐代在内宫设有女官，与身份低贱的女医不同，这些女官身份都比较高，她们根据身份的不同而拥有不同的品级。她们分为内官与宫官两个系统。内官的地位较高，这其中品级最高的是妃三人，均为正一品，惠妃一，丽妃二，华妃三，三妃负责辅佐皇后管理内宫的大小

事务，“坐而论妇礼者也，其于内，则无所不统”。其下是六仪六人，正二品，负责率其所属，举行典礼时依照仪式赞唱引导皇后。美人四人，正三品，掌率女官，负责祭祀、接待宾客等事宜。才人七人，正四品，负责宴席等事宜以及缫丝绩麻之事。宫官指六尚，如同外朝六尚书之职掌。有尚宫二人，正五品，负责出纳文簿等事务；尚仪二人，正五品，负责礼仪起居等事务；尚服二人，正五品，负责专供内廷的衣服以及饰品等事务；尚食二人，正五品，负责后厨事务；尚寝二人，正五品，负责燕寝进御之次序；尚功二人，正五品，掌女功的考课；宫正一人，正五品，掌戒令、纠禁、谪罚之事。诸尚宫之下都还有不同的辅佐女官，她们也属于宫官，内官与宫官构成一个庞大的女官系统。(徐乐帅)

11 究竟是谁把纸送到了西方？

众所周知，早在西汉时期中国劳动人民就已经发明了造纸术，先后出现絮纸和麻纤维纸。东汉蔡伦105年改进造纸术，出现了植物纤维纸。6世纪的时候，造纸术传到了朝鲜、越南和日本。纸的发明改变了中国社会的发展历程，同时也对世界历史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那么造纸术是如何传到西方的？到底是谁把纸送到了西方？这要从中亚一场国际性的战争讲起。

8世纪中叶，在西亚兴起的阿拉伯帝国侵入中亚地区，彻底消灭萨珊波斯，并打击、侵蚀中亚，于是以石国为代表的昭武九姓纷纷上书唐朝皇帝，请求中央出兵支援。751年，朝廷命令西域大将高仙芝率领大军挺进中亚，力图稳定局势。不过令人遗憾的是，刚在不久前征服大小勃律的高仙芝变得骄横起来，他率领由多民族士兵组成的区区三万蕃汉军队，一直深入到中亚北部的怛逻斯河岸（今哈萨克斯坦的江布尔城附近），丝毫没有预料到一场大规模恶战的发生。同时他违反了唐朝一贯的怀柔政策，对少数暂时屈服于阿拉伯帝国的政权残酷打击，特别是杀掉了石国国王。这一举动震撼了昭武九姓各国，它们在石国太子带领下纷纷倒向阿拉伯帝国一方。结果在怛逻斯与阿拉伯军队遭遇时，唐军陷入孤立无援的危险境地。大战开始，两军锋芒皆盛，对峙五天未分胜负。但突然间，“葛罗禄部众叛，与大食夹攻唐军，仙芝大败，士卒死亡略尽，所余才数千人”。另据巴托尔德《突厥斯坦》和沙畹《西突厥史料》记载：这次大战后，阿拉伯将军齐雅德·伊本·萨里带着数千名唐军俘虏回到撒马尔罕。

就在这些被俘获的唐军士兵当中，有不少是造纸工匠。阿拔斯王朝第一任哈里发阿布·阿拔斯·萨法赫在撒马尔罕专门设立了造纸作坊，请这些造纸工匠为阿拉伯帝国工作。不久，这里开始出产一种质地优良的纸张，闻名于整个西方世界，被称为撒马尔罕纸。后来，阿拉伯人又请中国工人到报达（当时是阿拔斯王朝德国都），建立纸厂，从

事造纸。这样，阿拉伯人就掌握了造纸技术。中国的造纸术由此而被带到了中亚和西亚各地，在13世纪又由阿拉伯人传到了欧洲，之后进一步传播到美洲等世界各地。（刘永连）

四大发明是怎么西传的?

造纸术、印刷术、火药和指南针是中国古代伟大的四项发明，它们的出现深深地影响和改变了人类社会和历史的发展进程。那么，除了造纸术之外，其他几项发明又是如何西传的呢?

指南针。战国时期我国带动人民根据磁石指南的特性发明了“司南”。北宋时已会使用磁针指南，后装于罗盘上，制成指南针用于航海。南宋时随着中外海上贸易和航海事业的发展，指南针传到了印度、阿拉伯、波斯等国，为新航路的开辟和实现环球航行提供了重要条件。

印刷术。隋唐时期已有雕版印刷的佛经和诗，现存世界上最早的雕版印刷品是868年我国印制的《金刚经》卷子。11世纪，北宋毕昇发明活字印刷术，比欧洲早四百年。活字印刷术发明以后，随着中外贸易活动的发展，向东传入朝鲜、日本，向西传入埃及和欧洲，改变了当时欧洲只有僧侣才能读书和受高等教育的状况。

火药。火药的发明来源于中国古代的炼丹术。唐朝时火药开始用于军事，北宋时火药已在军事上广泛使用，南宋时又有所发展。金朝火器制造业发达，曾用火器打败蒙古军队。我国的火药随着13世纪蒙古军队的西征而传入阿拉伯，后由阿拉伯人传入了欧洲。

可以说，四大发明向西传播到世界各地，从经济、文化、军事等各个领域促进了整个人类文明突飞猛进的发展，是中国人民对人类社会的巨大贡献。（刘永连）

12“爆竹”何时变成了“鞭炮”？

鞭炮起源于古代的“爆竹”，至今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了。关于“爆竹”的演变过程，《通俗编·排优》是这样记载的：“古时爆竹，皆以真竹着火爆之，故唐人诗亦称爆竿。后人卷纸为之，称曰 爆竹 。”也就是说，最初，人们燃放爆竹的时候，是把真正的竹子点上火，让它发出爆裂的声音。据《说郛》所引《荆楚岁时记》记载：“正月一日，鸡鸣而起。先于庭前爆竹，以避山臊恶鬼。”可见当时已经有了春节放爆竹的习俗，而且这一时期燃烧“爆竹”，是希望利用竹子着火之后爆裂的声音来赶走怪兽恶鬼。到了唐朝，爆竹又被人们称为“爆竿”，也是燃烧竹竿，使其发出爆裂声的意思。唐朝诗人来鹄的《早春诗》中有“新历才将半纸开，小庭犹聚爆竿灰”的句子，这里的“爆竿”就是指的“爆竹”。

从唐代开始，爆竹开始有了新的发展。唐初，就开始有人把硝石装在竹筒里燃放。后来，炼丹家在炼制丹药的过程中，经过不断的试验，发现硝石、硫黄和木炭合在一起能引起燃烧和爆炸，于是便发明了火药。火药出现之后，人们就开始把火药填充在竹筒里燃烧，这样爆炸之后产生的声音更大。此后，火烧竹子这一古老的习俗也就随之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到了宋代，民间开始普遍用纸筒和麻茎裹上火药，编成串，做成“编炮”，也就是我们现在说的“鞭炮”，并且已经有了单响双响等不同的种类。（王晓丽）

春节贴春联的习俗到底是何时形成的?

新春佳节贴春联早已成为中国人的一项重要民俗活动。这项活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从传统的文献资料来看，最早的对联是五代时期后蜀君主孟昶写的。据《宋史·蜀世家》记载，孟昶在乾德元年（963）岁除日，自命笔题桃符，其辞为：“新年纳余庆，嘉节号长春。”《楹联丛话》对此评论说：“楹帖始于桃符，蜀孟昶 余庆、长春一联最古。”然而事实并非如此，敦煌藏经洞出土的一份唐代时期的文

书，为人们了解这一久远的民俗，提供了详细的资料。这份卷号为斯坦因0610的文书中抄录了当时的桃符题词和对联，内容如下：“岁日：三阳始布，四序初开。福庆初新，寿禄延长 三阳 始，四序来祥。福延新日，庆寿无疆 立春日：铜浑初庆垫，玉律始调阳。五福除三祸，万古 （殓）百殃。宝鸡能僻（辟）恶，瑞燕解呈祥。立春 （著）户上，富贵子孙昌 三阳始布，四猛（孟）初开。 故往，逐吉新来。年年多庆，月月无灾。鸡 辟恶，燕复宜财。门神护卫，厉鬼藏埋。书门左右，吾傥康哉！”

据敦煌民俗专家谭蝉雪的研究，这一文书上所载的对联从时间上看，“岁日”、“立春日”正是我国传统习俗书写楹联的时候，也是唐代人挂桃符的时候；从内容上看，这些对联全都是祈福禳灾的内容；从句式上看，文句对偶，正是对联的格式，而且文中有“书门左右”的明确交待，因此，这一文书所载的无疑就是桃符题辞，也就是后来所说的对联。这些对联都是写在文书的背面，前后均无题记，正面是《启颜录》的抄本，尾题：“开元十一年捌月五日写了，刘丘子投二舅。”结合对联中所提到的民俗流行的历史时期，谭蝉雪研究员认为这些对联的写作时间大体上应该是在盛唐。也就是说，在唐代，不但已经有了对联，而且春节贴春联的习俗也已经形成了。（王晓丽）

13“唐三彩”真的只有三种色彩吗?

唐三彩是唐朝生产的一种彩陶工艺品。它以造型生动逼真、色泽艳丽和富有生活气息而著称。从质地上讲，这是一种低温釉陶器。它主要是陶坯上涂上的彩釉，在烘制过程中发生化学变化。由于在色釉中加入不同的金属氧化物，经过焙烧，便形成浅黄、赭黄、浅绿、深绿、天蓝、褐红、茄紫等多种色彩，但多以黄、褐、绿三色为主。其色釉浓淡变化、互相浸润、斑驳淋漓、色彩自然协调，花纹流畅，是一种具有中国独特风格的传统工艺品。

唐三彩载乐骆驼俑

“唐三彩”一词，不见于古代文献，最早的记载是民国时期，但专业研究者则多以“唐彩色釉陶”之名称呼，从严格意义上说，后者更具科学性，因为从工艺上看，唐三彩是“釉”而算不上“彩”。这种釉陶以黄、褐、绿为基本釉色，但不一定每件成品都是三色俱全，还可利用三色交叉混合的上釉技术来制造出五彩缤纷的美丽图案。三彩陶器主要用作明器（随葬器物），凡建筑、家具、日用品、牲畜、人物等等，形形色色应有尽有。从现存的各种唐三彩看，它是反映唐代社会生活最完整的手工艺品，几乎没有一种唐代手工艺品的种类可以超过唐三彩的品种。其中较为人喜爱的是马俑，有的扬足飞奔，有的徘徊伫立，有的引颈嘶鸣，均表现出栩栩如生的各种姿态。人物造型有妇女、文官、武将、胡俑、天王，根据人物的社会地位和等级，刻画出不同的性格和特征：贵妇面部丰圆，梳成各式发髻，穿着色彩鲜艳的服装；文官彬彬有礼；武士刚烈勇猛；胡俑高鼻深目；天王怒目威武，是我国古代雕塑的典范精品。

唐三彩生产基地主要分布在长安和洛阳两地，在长安的称西窑，在洛阳的称东窑。唐三彩流行于唐高宗至唐玄宗时期，造型多样，釉色润泽，色彩绚丽，开元后期突然衰落。盛唐乃是唐代与西方联系最密切的时间段，唐三彩反映了这一时代特点，器型往往仿中亚和西亚

的金银器，雕塑也出现骆驼和胡人之类形象，所以唐三彩往往被今人当作丝绸之路的形象资料。天宝后两京地区之外的三彩还延续了很长时间，出现了实用器，但由于含铅、有毒而未能流行。（刘永连）

唐三彩是唐朝最名贵的陶瓷吗?

唐三彩用于随葬，是明器，再加上其胎质松脆，防水性能差，实用性远不如当时已经出现的青瓷和白瓷。换言之，唐三彩并不是唐朝最名贵的陶瓷。唐朝的名贵陶瓷多出自当时的一些制瓷名窑。

唐朝陶瓷业达到了很高的水平。从这时起瓷器制造与陶器制造完全分离，形成一个独立的手工业生产部门，瓷器已代替金、银、漆器成为不可缺少的日用器皿，并且大量出口。一些制瓷中心逐渐形成名窑，出现了以青瓷和白瓷为代表的两大系统。青瓷以越窑为代表，白瓷以邢窑、曲阳窑为代表。

花釉瓷壶

唐代已可以烧造出精美的白瓷。唐代陆羽在他的《茶经》中用“类银”、“类雪”来形容邢窑白瓷的釉色，其胎、其釉的白度相当成熟。邢窑白瓷在烧成技术上也比较高超，从现有实物来看，没有变型、歪塌等缺陷，制作工艺精细、造型端正，不失为一代名瓷。邢窑白瓷除以色白见长外，其另一个特点是朴素少饰，匠师的艺术表现多施于造型之中，器型简洁、质朴、端庄而大气。它所构成的器皿容量大、重心稳、使用方便。这一时期最具特点的器皿是执壶，据考证是由前代的鸡头壶演变而来，是一种酒具，唐人称为“注子”。此外，黄河流域瓷窑多烧白瓷，河南、山西、陕西的广大地区都以烧白瓷为主。杜甫在《于韦处乞大邑瓷碗》诗中咏白瓷说：“大邑烧瓷轻且坚，扣如哀玉（清脆的玉声）锦城传。君家白碗胜霜雪，急送茅斋也可怜。”

不过，当时水平最高的还是青瓷。它是唐代瓷器的主流，窑址遍布南北。由于唐代的饮茶之风兴盛及朝廷对青瓷的需求量增大，促使唐代的越窑青瓷质量不断提高。尤其在晚唐时期，形成了以浙江余姚为中心的瓷区，产品胎质细腻，釉层匀净，造型规整，品种丰富。在

装饰处理上也是以釉色装饰为主流，以素面为主，形成独特风格。刻花装饰以简洁流畅的线条，寥寥数笔就描绘出荷花、荷叶等花卉，绝无繁琐多余之笔。唐陆龟蒙诗："九秋风露越窑开，夺得千峰翠色来"，将它比作荷叶，比作澄澄秋水，则是赞美其釉色晶莹清澈，青翠莹润。陆羽在《茶经》里评价各地瓷茶具时就特别崇尚青瓷："碗，越州上，鼎州次，婺州次，岳州次，寿州、洪州次。或者以邢州处越州上，殊为不然。"（卢坤霞、刘永连）

14 唐朝人为什么用香料来建造房子?

香料是人们生活中珍贵的用品，不但一般人难以有条件使用，而且使用上一般制成粉剂和香水，只是微量地用来香身除臭。然而，在唐朝香料还有惊人的用法，譬如用来建造房子。

根据两《唐书》和唐人笔记载录，我们惊奇地发现唐朝人竟然用香料建造亭台楼阁。例如，唐玄宗在兴庆宫里为杨贵妃全用沉香木建造了沉香亭；杨国忠家里也曾以沉香木建造了一座楼阁。此外，武则天面首张昌宗、唐中宗小女儿安乐公主以及中宗宰相宗楚客、德宗宰相元载等也都曾把沉香用在建筑上。

令人更为惊讶的是，用沉香建造房子不是个别现象，而是流行成风。有什么根据呢?《资治通鉴》记载，以理财大家杜佑为代表，唐人对沉香取材的认识已经形成一套理论。杜佑说："沉香所出非一，形多异而名亦不一：有如犀角者，谓之犀角沉；如燕口者，谓之燕口沉；如附子者，谓之附子沉；如梭者，谓之梭沉；纹坚而理致者，谓之横阳沉。今其材（指当时刚由波斯人李苏沙进献到朝廷来的一批沉香）可为亭子，则条段又非诸沉比矣。"看来，唐人已经非常清楚什么样的沉香材质可以建造房子。

其实，唐人能用沉香建造房子不是偶然的。首先它与唐代香料贸易的发达有直接关系。大约自唐朝中期开始，海陆交通超越陆路而发达，海船可以直接往来于南中国海与波斯湾之间，从而使东南亚、南亚、西亚乃至非洲等地的香料大量涌入中国。《大唐和尚东征传》就记述，鉴真和尚曾在广州看到珠江水面云集着各国海船，船上香料山堆海积。另据其他各种文献透露，香料品种琳琅满目，至少几十种。如此一来，香料就不像其他朝代那么稀奇难得。其次沉香不比其他香料。乳香出自一种树木乳液，麝香是一种类似鹿的动物的分泌液，苏合香是多种香粉调配而成。然而沉香出自一种珍奇的树木，质地特别坚硬沉重，放进水里就会沉底，故而得名沉香。据说中南半岛南端的

土著居民，将这种树木采伐成段，埋藏在地下，多年之后树皮腐烂，只留下坚硬的木质部分，黑硬如铁，就成为沉香。用这种木料来建造房子，不但香气满庭，而且坚固异常。再次这还与当时社会背景密切相关。唐代是人们物质生产丰富而且精神视野广阔的一个时代，人们攀比豪奢，在建筑上也无奇不有。除了使用香料外，其他奇珍异宝多不胜数。例如，张易之宅第“红粉泥壁，文柏贴柱，琉璃沉香为饰”；宗楚客房子“皆是文柏为梁，沉香和红粉以泥壁，开门则向其蓬勃。磨文石为阶砌及地，着吉莫靴者行则仆地”；元载芸辉堂“以沉香为梁栋，金银为户牖” 因此，尽管千年过去了，但是唐代建筑业仍有许多神秘奇特之处值得我们探讨。（刘永连）

唐朝都有哪些建筑奇迹?

唐朝是一个创造奇迹的时代，建筑业上也为其他朝代所不逮。其建筑奇迹不但多，而且空前绝后。

唐朝最大的奇迹是都城长安的兴建。该城东西长9721米，南北长8651米，总面积达到了84平方公里，相当于明代长安城的十倍，是中国古代最大的一座城市，也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城市。非但如此，该城在城市规划上也是当时世界一流水平。全城内外三层，有宫城、皇城、外郭城，有110个以坊为名的居民区，有千千万万高门大院、亭台楼阁乃至巍峨宫殿，但是在布局上却能做到整齐划一。全城14条东西大街、11条南北大街，将城内分割成棋盘条块，里门坊墙、钟楼鼓楼等安全设施一应俱全；绿化林荫、排水沟渠等城建措施百无一疏。同时，由于城内河渠密布，园林众多，布局典雅，后来学者公认长安是世界古代园林城市的典范。

大雁塔

长安城里最显眼的建筑群是大明宫。从高宗至唐末二百余年，皇帝基本上都在这里办公居住，面积是明清故宫的二倍，殿阁规模更非其他宫殿能比。其正殿称含元殿，高高地矗立于长安最高处龙首原上。据考古发掘可知，该殿东西有11间，进深4间，每间有5米长宽，

殿侧有对称的回廊和楼阁，殿前是宽阔且悠长的玉阶龙道，整个布局协调，气势宏伟。

大、小雁塔是保存至今的唐代建筑。其中大雁塔是唐高宗为存放玄奘法师从印度带来的佛教经卷而敕令建造的，样式为仿木结构的楼阁式砖塔，现高64米，塔身为四方锥形，逐层缩小，造型简洁，古朴大方，每层都有券门、隐柱、斗拱以及塔檐、栏额等，既稳固如山，又雕画精细，一千三百多年的风雨战火仍然没有损伤其雄姿丽影，可谓是建筑史上一大奇迹。小雁塔建于中宗时期，原高15层，为密檐式砖塔，俊秀挺拔，小巧玲珑。让人称奇的是，该塔曾在明代成化二十三年（1487）因遭临潼6 5级地震而塔身中裂，自顶至足出现一道一尺多宽的裂缝，但三十四年后关中再震，其裂缝反而弥合。建筑专家研究后指出，这主要是因为该塔塔基预先设计了一种称球状可以调节塔身平衡的巧妙机关。面对这种千年以前就有的建筑技术，我们不得不望洋兴叹。(刘永连)

15“李白斗酒诗百篇”，但为什么说李白算不上海量呢？(

我们都熟悉的大诗人李白是个多才而又嗜酒之人，有“李白斗酒诗百篇”之说。然而就当时情况而言，李白还算不上海量，这是为什么呢？

鎏金伎乐纹八棱银杯在中国，酒的历史和文化源远流长。早在远古时期，一些含有糖分的水果、兽乳等自然发酵而形成酒，传说中的“猿猴造酒”其实就是猿猴吃剩的水果自然发酵而成的酒。之后，人们开始自觉地人工造酒。大概在距今四五千年以前，就已经出现了用谷物和水果酿成的酒，其中谷物酒占的比重比较大。仰韶文化、龙山文化时期的古人用发了芽的谷粒（称为蘖）酿造谷物酒。秦汉时期，用蘖造酒的技术仍然沿用，但是人们已经开始大量地使用酒曲。《汉书·食货志》记载：“一酿用粗米二斛，麴一斛，得成酒六斛六斗。”可见人们用曲作酒已经非常熟练了。在文献当中，一般把用蘖酿造的“酒”称为醴，把用曲制作的“酒”称为酒。宋应星在《天工开物》一书中说道：“古来曲造酒，蘖造醴。后世厌醴味薄，遂致失传，则并蘖法亦亡。”可见醴是比酒更淡的一种饮料。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制作酒曲的工艺日益完善。北魏贾思勰所著的农书《齐民要术》中记载了十二种制曲的方法，这些酒曲的基本制造方法现在仍然应用于高粱酒的酿造当中。

汉代酿酒图（画像砖）

实际上，不管是用蘖酿成的“醴”还是用酒曲酿成的“酒”，度数都是很低的。这是因为酒精是酵母菌糖代谢的产物，对酵母菌的发酵有一定抑制作用，在单纯的酒曲发酵过程中，当酒精的成分达到一定程度时，酵母菌就会停止繁殖，发酵的过程也就随之放慢。据估计，传统酒曲发酵工艺酿造出来的酒，酒精度仅在10%左右，大概相当于我们今天喝的啤酒的酒精度。这样看来，唐代的“李白斗酒诗百篇”和宋

代的武松连喝十八碗打死老虎这样的惊人酒量也就不那么令人咂舌了。

与酿造酒相区别，跟我们今天喝的白酒更为接近的是蒸馏酒，也就是民间所说的烧酒。这种酒的制作工艺，简单地说，就是把酒曲发酵酿造的酒用蒸馏器再蒸馏一下，以得到度数更高的酒。（王晓丽）

经过蒸馏的烧酒究竟发明于何时?

那么，我们何时才有了像现在白酒这样经过蒸馏的白酒呢?

有专家列举唐诗数首和李肇《唐国史补》以为证据，认为在中国经过蒸馏的烧酒是唐宋时期开始出现的。白居易云："荔枝新熟鸡冠色，烧酒除闻琥珀香。"雍陶亦云："自到成都烧酒熟，不思身更入长安。"李肇《唐国史补》也提到"酒则有剑南之烧春"。但是另有专家认为，这些不足以说明问题，因为从四川烧酒的资料看，当时的烧酒应与吃火锅类似，喝的是一种额外加热的米酒，而非现代蒸馏的烧酒。还有人凭借考古中发现的一套金代的铜制蒸馏器（1975年发现于河北青龙县）来证明"唐宋"说。但测量后有人认为，这套器皿尽管确属蒸馏器，不过却无法用于实际的酿酒生产，所以不能认定这时候的酒是蒸馏加工的烧酒。

目前学术界认为"蒙元"说比较可信。李时珍《本草纲目》云："烧酒非古法也，自元时创始。其法用浓酒和糟入甑，蒸令气上，用器承滴露。凡酿坏之酒皆可蒸烧。近时唯以糯米或粳米或黍或秫或大麦，蒸熟和曲酿瓮中七日，以甑蒸取，其清如水，味极浓烈。"这些叙述已颇准确可靠。同时考古上有江西李渡烧酒作坊、成都水井街酒坊等元末明初考古遗迹发现，炉灶、晾堂以及蒸馏设施一应俱全。可见这一时期有蒸馏烧酒生产确凿无疑。

其实，一种东西的传播不见得能够一蹴而就，历史上许许多多的技术乃至简单的物种、物品传播都有多次传播、多次发展的过程。我们不能武断否定经过蒸馏的烧酒在唐代就确实没有，不过李白等大多数人所喝的酒绝非这一类酒，因为很可能这时候烧酒只是初步传入，

还没有获得人们适应和较大规模生产。即使到了宋、元时期，尽管甚至已可明确有了这种酿酒技术，但是也还是逐步推广的。

因为《水浒传》中描绘武松打虎的情节，说他喝了18碗酒，按古代碗具的容量算，起码也有十几斤，此酒不可能是烧酒。蒸馏烧酒普及中国，恐怕确实要到李时珍时代甚至更晚，这并不意味着中国进步太慢，因为米酒作为不胜酒力者的饮品比烧酒更是美味，完全可以两种酒类同时发展。就像今天，我们既有蒸馏过的白酒，也有啤酒、葡萄酒，其实米酒在陕西、浙江等许多地方照旧流行着。（刘永连）

16 中国人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喝葡萄酒的呢?

对于中国而言，葡萄酒是一种舶来品。尽管在地中海沿岸包括埃及、西亚和南欧等地区，葡萄酒早在数千年前就已大量生产了，但是中国人喝到葡萄酒则是比较晚的事情了。

有学者认为，在秦汉时期中国境内已经酿造葡萄酒了。不过它还局限于西北边疆地区，并没有传播到中原一带。《汉武帝内传》记述，武帝招待西王母时，曾“列玉门之枣，酌葡萄之醴”。说的虽是神话，却也是现实的反映。这说明，尽管不能肯定中原地区也已学会了酿造葡萄酒的技术，但是中原社会上层确实喝到了葡萄酒了。

海兽葡萄铜镜不过，此后数百年之间中国史籍没有提及葡萄酒的酿造技术。虽然不时有葡萄酒出现，但是它只是作为成品出现，而且局限于宫廷之中和社会上层。到东汉的时候，葡萄酒还非常的珍贵。《后汉书·宦者列传》注中引《三辅决录》说孟佗“以蒲陶酒一斗遗让，让即拜佗为凉州刺史”。可见当时葡萄酒的价值之高。魏晋南北朝时期，葡萄酒仍然属于难得之物，《北齐书·李元忠传》载李元忠“曾贡世宗蒲桃酒一盘，世宗报以百练缣”。

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唐代。《唐会要》卷100《杂录》记载：“葡萄酒，西域有之，前世或有贡献。及破高昌，收马乳葡萄实于苑中种之，并得其酒法，自损益造酒。酒成，凡有八色，芳香酷烈，味兼醍醐。既颁赐群臣，京中始识其味。”可见，在唐太宗贞观十四年（640）破高昌之后，葡萄酒的酿造技术正式传入中原。此后二百多年内，葡萄酒的酿造和在社会上的传播都得到了很大发展。史料反映，在唐代，中国人自己酿造的葡萄酒至少出现了两大名牌。最好的是凉州葡萄酒，产于今天的武威一带。据载当年李白写出《清平调》三首之时，杨贵妃就用凉州葡萄酒给予赏赐。另一种河东“乾和葡萄酒”，产于今天的山西一带，为好酒者所赞赏。这时候，咏叹葡萄酒的诗句也在唐人诗集里层出不穷地涌现。王翰《凉州词》中的“葡萄美酒夜光

杯，欲饮琵琶马上催”为美味的葡萄酒千古留名；而李白、王维、白居易、刘禹锡、岑参和王绩等人的吟咏更使中国的各色葡萄酒璀璨斑斓。由此看，至少从唐代开始，葡萄酒在中国境内广泛酿制，终于成为中原官吏文人也能尝到的美酒了。（刘永连）

葡萄种植是怎么传入中国的?

葡萄种植的传播是中国人酿制和喝到葡萄酒的前提和基础，也为学界至今所关注。但是关于葡萄种植究竟何时和怎样传入中国内地的这一问题，史料留有不少谜团，学界对此争论不休。

葡萄花鸟纹银香囊

关于传入时间问题，学界流行着六种观点。一是西周时期早已传入。这一观点主要是凭借神话传说故事来判定。二是秦代传入。持此观点者认为司马相如在《上林赋》描写秦都咸阳胜景，已经提到葡萄种植。三是汉代以前说，凭借的也是司马相如的《上林赋》。四是至迟在西汉建元四年（前137）。这一年是《上林赋》成文时间，有学者认为司马相如撰文是在以古讽今，描写的还是当时现实情况。五是西汉元朔三年（前126），即张骞出使西域回来之年。六是西汉太初四年（前101），即李广利胜利完成远征大宛之役凯旋归来。

考察看似众说纷纭的以上观点，如果考虑到物种传播的基本规律和具体情况，我们就会发现其实它们并不矛盾。西周之说姑且不论，但大致在秦汉时期甚至以前已有葡萄种植传入是基本可以肯定的。

考察葡萄传播的路线和趋势可知，葡萄种植在数千年前发源于地中海沿岸，沿着陆上丝绸之路逐步向东传播，伴随着每一次西方民族的东迁都会向东伸展。而据人类学和民族学界的考据证明，至迟在公元前1500年左右塞族部落的东支 吐火罗人已经在我国新疆地区安家落户，带去了麦子等粮食，也可能带去了葡萄等水果。结合葡萄考古和文献记载，可以确定至少在公元前6世纪咸海以东、锡尔河沿岸已经种满葡萄；同时至少在公元前2世纪张骞出使西域之前中亚至新疆一带也已大规模种植着葡萄。而在张骞之前，并非没有人从中原进入西域。

公元前10世纪的时候，我国古老的羌族部落早就蔓延到中亚地区，同时周穆王驾车西征，据说到了旷原即锡尔河以北草原，从西域带回了美玉，也可能带回了葡萄。至于沿丝路西行的商队，则不知已有多少支、多少回。正因为早在张骞之前已有不少人沿着丝绸之路往来，带回了不少西域物产，所以司马相如才得以早早在咸阳、长安见到种植的葡萄。

至于《史记·大宛列传》所载："宛左右以蒲陶为酒，富人藏酒至万余石，久者数十岁不败。俗嗜酒，马嗜苜蓿。汉使取其实来，于是天子始种苜蓿、蒲陶肥饶地。及天马多，外国使来众，则离宫别观旁尽种蒲陶、苜蓿极望。"这已经是以非常确凿的史实证明了长安一带葡萄种植的盛况，不能称之为最早和开始。

关于葡萄种植的传入，可以这样说：?代中西交通不像现代这么发达，文化交流也没有现在这么通畅，每一物种的传播几乎不可能做到一蹴而就。葡萄种植的东渐和传入是在无数人往来所促成的无数次文化涌动的情况下完成的。如果言其最早，可能早在先秦某个时候；如须形成一定规模，则在西汉武帝时期足以完成。

17 盗版书最早从何时在市面上泛滥?

改革开放以来，出版事业有了很大发展，不但大量图书得以出版发行，而且流行起一个比较时新的名词“盗版书”。不过，如果仅就其性质而言，“盗版书”很早就已产生，并曾在市面泛滥成灾。那么，盗版书最早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在市面上泛滥的?

隋唐时期，印刷术的早期形式 雕版印刷得以发明。唐太宗在位时期，曾经为长孙皇后刊印她的专著《女则》；玄奘取经回国之后，也曾用回锋纸雕印普贤菩萨像，一年就印五驮。宣宗在位时期，江南西道观察使纥干泉雕撰道家著述《刘宏传》，一次印出数千本，赠送给四海所有精心修道的人。

不过，以上都是经过朝廷允许才印刷的，还不在“盗版书”之列。盗版书与民间印刷业的发展密切相关。据研究，由于唐代民富国强，印刷术在民间也迅速发展起来。例如，德宗在位时期（780至804），市场上出现了可以作为商人交易凭据的印刷品“印纸”。国内现存最早的印刷品《金刚经》卷子，据说是咸通九年（868）由一个叫王玠的人出资刊印的。从后世发现的敦煌卷子里，可以看到“京中李家于东市印”的医学著述、成都府樊家印行的历书等。在吐鲁番地区，还出土了印刷于武周时期（690至705）的《妙法莲华经》等许多佛教经卷（现藏日本书道博物馆）。

再具体一些，“盗版书”与唐代兴起的一股市场风潮有直接关系。史料显示，在印刷术发展的基础上，“历书”到唐代逐渐以印刷本形式流行起来。这种书籍与现在各种“日历”类似，每年一版，标识年、月、日等，不过还有提示农民四时耕种、起居行止等方面的内容，为民间百姓居家生活所亟需。这种东西本来应该先由司天监发布，然后官府统一印刷、供应，但是由于市场广阔，官方印刷业一时难以覆盖，严重供不应求。结果，不少私人印刷业主乘虚而入，大量盗版私印“历书”。文宗大和九年（835），东川节度使冯宿上报朝廷，说是在

剑南东、西两川及淮南道等地区，发现有大量民间私印“历书”“日鬻于市”，充斥了市场，甚至每年还未等到司天监发布颁行，民间私印的新年“历书”“已满天下”。可见这时候“盗版书”已经泛滥成灾了。

还有史料反映，当时民间“盗版书”因技术水平有限而常出问题。《唐语林》卷七记述了一个案例。当时京城动乱，皇帝逃到剑南一带，官印“历书”不能普及，导致在江东一带私印“历书”泛滥。然而这些“历书”印刷粗劣，竟然出现不同印家印刷出来的“历书”所标识的大、小月相互矛盾，百姓邻居依据不一，各执己见，甚至发生纠纷。由于后果严重，朝廷多次下令“禁断”私人印刷“历书”，但是没有明显效果。

此外，据元稹为白居易诗集撰写的序言所说，早在白氏自己结集之前，他的诗歌早已被人纂辑起来，雕印成册在市面上到处叫卖，而高丽、日本等国使者每来中国，最重要的任务就是到市面上求购白居易、刘禹锡等著名诗人的诗集。这些未经作者同意而私自印刷出版的诗集，应该属于性质更为严重的“盗版”行为，只是当时还没有知识产权的概念，诗人们见到这种情况不但没有将其上告法庭，反而因为自己的作品受到欢迎而引以为荣。（刘永连）

我国的私人图书馆出现于何时?

唐代图书事业大发展的一个突出表现是，民间私人图书馆开始出现了，从此开了私人藏书的先河。在唐代以前，历代图书都是主要由官府掌握，民间是不允许大量藏书的。在某些时代，如秦朝，甚至采取“焚书坑儒”的手段来取缔私人藏书。同时这时图书都是由人逐本抄写，极为不易，所以即使官府藏书量也极有限。唐朝时期就不同了。在印刷业发展的基础上，官府藏书有了重大发展，秘书监藏书量达数十万卷，数倍于隋朝时期的规模。同时由于文化政策开明，民间印刷业也很发达，私人藏书飞速发展。韩愈有诗描绘说，在老朋友邺侯家里，曾经是“插轴三万卷”，可见这一家藏书就有三万卷之多。唐朝末

期，眉州有著名的“孙家书楼”，藏书量在四川地区首屈一指。（刘永连）

18 人类“文明之母”指的是什么东西?

印刷术和指南针、火药、造纸术共称为中国古代的四大发明。印刷术的发明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从隋代开始出现，到唐代达到极盛的雕刻印刷术，第二个阶段就是宋代开始出现的活字印刷术。印刷术的发明是我国古代劳动人民智慧的象征，它对人类文明的贡献是不可估量的。

在印刷术发明之前，文化的传播主要靠读书人用手抄书，不仅浪费时间，而且还容易出错，在很大程度上阻碍了社会文化的发展。隋代，出现了最早的印刷术 雕版印刷术。这种印刷方法是用刀在一块块木板上雕刻成凸出来的反写字，然后涂上墨，印到纸上。雕刻出来的每一块版都可以重复使用，印制大量的书籍，这样就使书籍的复制和传播变得相对容易。但是，雕版印刷都是整版的雕刻，每印一种新书，就要重新雕刻，一旦在雕刻过程中出现错误，就要毁掉重刻，因此，这种工作非常繁难而且速度很慢。北宋时期，在雕版印刷的基础上，发明了活字印刷术。这种印刷方法是用木头、泥块或者金属等材料先雕刻成一个个的单字，等到印刷的时候再根据书籍内容的需要进行组合印刷，这就大大提高了印刷效率。

印刷术的发明使印刷出来的书籍数量大增，从五代开始，中国就已经形成了官府刻书、坊间刻书和私人刻书三大刻书系统，出现了许多著名的刻书中心、刻书机构和刻书家，他们对中国文化的保存、积累、传播、交流都起到了巨大的作用。同时，印刷术还对世界文明的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早在雕版印刷术发明不久，唐代的雕版印本就传到日本以及其他东方邻国，15世纪，活字印刷术又传到欧洲，改变了欧洲只有僧侣才能读书和受高等教育的状况，对于欧洲的文艺复兴、西方近代印刷术的产生和发展，以至整个世界文化的发展和传播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因此，印刷术又被称为世界“文明之母”。（王晓丽）

中国古代的书籍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讲究版本的呢?

在印刷术发明之后，书籍就被大量地复制印刷，在文化传播的进程中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在中国古代，印刷术主要是雕版印刷和活字印刷，这两种印刷方法都需要先刻字，后印刷，人们习惯上把这样印刷出来的书籍称为“刻本”。一般来说，唐以后的刻本可以分为由朝廷或者是其他国家机构出资刻印的官刻本、由各地书商以盈利为目的自行刻印的坊刻本和私人自己刻印的私宅刻本等等。在唐代，雕版印刷的刻本主要以寺院刻本和坊刻本为主。

除了寺院刻经之外，在坊刻本中，根据对保留到今天的屈指可数的唐代印刷品的研究，可以知道当时的刻家有“龙池坊卞家”、“成都府樊赏家”、“西川过家”、“京中李家”等。如20世纪40年代在成都望江楼附近的唐代墓葬中出土的《陀罗尼经咒》，其上文字隐约可见“成都府”、“龙池坊卞家”等字样，这也是我国现存年代最早的印刷品。另外，敦煌遗书中的《剑南西川成都府樊赏家历》，带有“西川过家真印本”字样《金刚般若波罗蜜经》等都给我们提供了当时刻书名家的资料。由此可知，四川的印刷业在当时是盛极一时的。据唐代柳玭《家训序》记载，唐僖宗中和三年（883），随僖宗入蜀的中书舍人柳玭在成都“阅书于重城之东南，其书多阴阳杂记、占梦相宅、九宫五纬之流，又有字书小学，率雕版印纸”，可见这一时期成都坊刻的内容已经十分丰富。实际上，唐代中叶以后，坊刻书商就已经遍布四川、安徽、江苏、浙江等地，并出现了一批以印卖诗文、历书、字书、阴阳杂记为业的人，这些书坊的刻本，也随之销往敦煌等蜀地之外的广大地区。（王晓丽）

19 世界上最早“量地球”的人是谁?

僧一行，俗名张遂，是唐代著名的天文学家，与祖冲之、张衡、李时珍齐名于世。他也曾翻译过多种印度佛经，成为佛教密宗的领袖。

唐高宗咸亨四年（673）一行出生于魏州昌乐(今河南濮阳市南乐县)。他刻苦好学，青年时期就精通天文、历法。开元五年（717），一行来到京都长安，在长安生活了十年，于开元十五年（727）逝世。十年中他致力于天文研究和历法改革，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开元九年（721），唐玄宗命令一行主持修订历法。一行主张在实测日月五星运行情况的基础上编制新历。他和机械专家梁令瓒一起，创制了黄道游仪、水运浑天仪等大型仪器。黄道游仪是浑仪的一种，用来观测日、月、星辰的位置和运行情况。一行等以新制的黄道游仪观测日月五星的运动，测量一些恒星的赤道坐标和对黄道的相对位置，发现这些恒星的位置同汉代所测结果有很大变动。水运浑天仪（浑象）是用水力驱动的能模仿天体运动的仪器，类似于现代的天球仪。这个浑象附有报时装置，可以自动报时。

开元十二年（724），一行发起和组织了一次大规模的天文测量活动。测量内容包括春分、秋分、冬至、夏至正午时分八尺之竿（表）的日影长、北极高度（天球北极的仰角）以及昼夜的长短等等。根据测量数据，一行计算出：北极高度差一度，南北两地相隔三百五十一里八十步，合现代的长度是151 07公里。这个数据实质上就是地球子午线（经线）上一度的长，虽然不十分精确，却是世界上大规模测量子午线的开端。国外最早实测子午线的是阿拉伯天文学家阿尔·花剌子模等人在公元814年进行的，晚于一行九十年。所以说一行是世界上最早“量地球”的人。（李晓敏）

唐人眼中的天文学是什么?

唐代的天文学是以星占为主体和依托的，担负着上天和皇帝之间的“联络人”角色。对于唐代的人来说，根本没有什么专门的“天文学”一说，天文就是星占，星占就是天文，二者没有什么根本的区别。唐代的天文官员叫“太史令”，他的职责就是观察日月星辰的变化，风云气色的变异，判断这些变化的祥瑞与否，以此来警示和告诫皇帝要修善政，止恶行，达到统治的长治久安，归根到底是为政治服务的。星占在唐代政治生活中有着积极的作用，朝野上下对星占学的政治功能是深信不疑的。

中国有以“天人感应”为基础的传统星占学，唐代的星占学就是在此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在古人眼中，日月星辰、草木鱼虫、风云雷电的变化都有占卜的意义。如日食和月食，今天看来就是自然现象而已，在唐代大天文学家李淳风的眼里，却与国家的政治兴衰密不可分。唐代的文献中也留下了不少当时占卜的记录。

初唐著名的天文学家和星占家李淳风，曾经制造了新型的浑天黄道铜仪，并著有《法象志》7卷，他的另一部著作《乙巳占》10卷是一本天文星占作品，摘编了许多现已失传的古代星占著作的片断，包括天文、气象、星占，内容很广泛。

20“跳龙门”是哪个朝代的典故?

“跳龙门”是唐朝一个典故。龙门就是现在洛阳南郊约13公里的伊河两岸，此处东西山对峙，伊水中流，远望如天然门阙，古称“伊阙”。传说很久以前龙门还未凿开，龙门山将伊水阻挡住，山南形成了一个大湖。居住在黄河的鲤鱼听说龙门山风景秀丽，想去观光，便通过洛河游到伊水中，来到龙门山下。但龙门山高，无水路可走，鲤鱼们便商议跳过龙门山，其中一条大红鲤鱼自告奋勇，率先起跳。它纵身一跃跳到半空中，夹杂着云雨向前冲，途中还被天火烧了尾巴，最终战胜了困难，跃过了龙门山落到山南的大湖里面，瞬间变成了一条龙。伊水中的鲤鱼们看到大红鲤鱼的情形被吓坏了，都不敢跳。天空中突然出现了一条龙，自称是大红鲤鱼的化身，鼓励它们都跳过去成为龙。鲤鱼们便纷纷跃起，向龙门山跳去，可是只有少数能够过去，跳不过去的从空中摔下来，额头上就落下一个黑疤，至今我们仍能在鲤鱼头部看到这个黑疤呢！唐朝大诗人李白就作诗咏叹此事：“黄河三尺鲤，本在孟津居。点额不成龙，归来伴凡鱼。”同时《埤雅·释鱼》有云：“俗说鱼跃龙门，过而为龙，唯鲤或然。”清代李元《蠕范·物体》则说得更为翔实：“鲤，昔者每岁季春逆流登龙门山，天火自后烧其尾，则化为龙。”

福建省莆田市鳌山村雁阵宫屋顶的塑雕“鲤鱼跳龙门”

不过，跳龙门在唐代还有另外一层意思。当时科举制度基本完善起来，天下士子们为高中科举而寒窗苦读，希望由此跻身仕途。据说由于千万士子趋之若鹜，每年的科举考试都十分热闹，曾惹得太宗皇帝兴奋异常，大手一挥豪迈地说：“天下英雄入吾彀矣！”然而另一方面问题是，想中科举十分不易，特别是进士科目，每次都是按照百分之一二的比例录取，难度不亚于鲤鱼跳龙门。不过考中进士之后，这些士子就会身价倍增，高官得做，倒也是一般人不敢企望的。因此，人们便用“鲤鱼跳龙门”比喻进士及第，暗指其绝高的难度和士子前后

截然不同的生活境遇。同时借用李白诗句中“点额而还”一词比喻科举考试中名落孙山的人。之后上千年间也确实有无数读书人鼓足勇气试跳“龙门”，甚至不惜终身困顿科场。（刘永连）

中了进士就能做官吗?

我们通常以为进士及第就像是“鲤鱼跳龙门”一般荣耀非凡，做官自然是水到渠成。可是在唐朝，中进士并非如此，不能直接做官。在唐朝的科举中通过了礼部试，即可获得“进士”的称号，只相当于有了出身，获得了做官的资格，要想获得官职还要通过吏部专门的选官考试，称为“吏部试”，主要考察体貌、言词、书法、判案等能力，其中以判案最重要，四个方面都合格才可脱去白衫，穿上官服等待朝廷任命，称为“释褐”。进士还可以参加贤良方正、直言极谏、博学宏词等制科的考试，通过的也可以授官。还可以先去各节度使那里做幕僚，经过了一段时间争取保举为官。比如韩愈三次经过吏部试都没有通过，他给宰相写信也没有被理睬，只得去节度使董晋那里做幕僚。有些进士没有门路，甚至及第后一二十年都没能做官。这一点与后来不一样，宋明清朝的科举中，只要参加殿试，就不会被淘汰，只是排一下名次，都可以获得“进士”称号。前几名如状元、榜眼、探花会被立刻授予高官，其余的进士只需等待，一般也可以获得官位。（刘永连）

21 进士第一名为什么称作“状元”或“状头”？

安徽歙县槐塘村“丞相状元坊”

首先从其字面意思直接理解，所谓“元”或“头”，同“首”或“始”，实为“最高”和“第一名”的意思。那么，为什么前面用“状”字修饰而非其状呢？这就与科举考试的某些具体程序有关了。

在科举考试过程中，礼部试是中间最重要的一关。在应考礼部试之前，举子们（地方选送的称“乡贡”或“贡生”；京城官学里的称“生徒”）必须先到礼部递送个人介绍资料，或叫说明身世和近况的书状，名为“投状”。因此考后成绩第一名就是投状者中的最高者，所以称为“状元”或“状头”。

另有一种说法，经过评阅考试卷子，考生成绩要发榜公布。据说发布的皇榜是用卷轴式的麻纸或绸帛制成，可以打开挂在墙上。榜上书写及第人名次，第一甲三名位置居上，而第一名位置最靠前，处于皇榜最高处。故而，进士及第第一名称为“状元”、“状头”，又称“榜首”。

还有人认为，所谓“状元”，可以理解为考试卷的第一份，当然也是成绩最好的。

除此之外，由于在唐代甚至宋初，进士及第的第二名、第三名的名头还没有确定，第二名所谓“榜眼”、第三名所谓“探花”与第一名作为第一甲同样位于榜首，故而又可以同时称为“状元”。大致到了南宋时期，“状元”才真正固定在第一名上。这又是不少人所不曾了解的。（刘永连）

“榜眼”、“探花”的名号是怎么演变来的？

“榜眼”和“探花”，现在一般认为分别是科举考试中进士考试名列第一甲第二名和第三名的称号，不过原来并非如此，而是经历了一定阶段演变来的。

在唐代，进士考试还没有“榜眼”的名号，而只有“探花”的名号。不过，“探花”当时称为“探花使”，与第三名也没有任何关系。它不是考试名次的标志，而是从当时进士及第后深受皇帝恩顾的趣味活动中产生出来的。进士及第后，朝廷一般会安排新进士们登临大雁塔、游玩曲江池等活动。在游玩了曲江池之后，皇帝要在曲江池边的杏林里摆设盛宴，招待这些荣登龙门的士子们。在杏林宴上，其中一个活动节目就是要在新进士中推选一个年轻英俊的小伙子，到皇家禁苑里采摘鲜花，以烘托宴席气氛。这位经过皇帝特许可以进入皇家禁苑的年轻进士号称“探花使”，往往被皇家或高官贵族看中而招为乘龙快婿，并且由于当时百姓围观人山人海，这种显眼的活动会赢得极大荣耀，所以成为新进士得意之处。这样，“探花”的名目就流传下来。

到了北宋，殿试成为必经的一次考试，皇帝钦点第一甲前三名（第一甲称为“进士及第”，第二甲、第三甲分别称为“进士出身”、“同进士出身”）。第二名、第三名分列状元左右，犹如其两眼，故而也称“榜眼”。也有人认为，其实“榜眼”与皇榜张挂的位置有关，因为书写第二名的两侧正好是皇榜卷轴挂钉的地方，犹如两眼，故称“榜眼”。不过这时候“榜眼”和“探花”的名号显然都还没有稳固确定在第二名和第三名上。

再到南宋，“榜眼”和“探花”才确定为进士考试第二名、第三名的名号，并与第一名亦即“状元”合成“三鼎甲”。不过，它们自始至终只是社会上对第一甲进士及第前三名的俗称，一般在礼部唱名和放榜时都还是称作进士及第第一名、第二名和第三名。（刘永连）

22“连中三元”是哪“三元”？(1)

“三元”是我国科举制度的产物，是解元、会元、状元的统称，最早产生于科举制度完善起来的中晚唐时期。

不过，在唐朝时候尚无“三元”之说，只是有了与此类似的“三头”的讲究。读书人首先参加由地方府州举行的选送资格考试，考试合格者称乡贡进士，第一名称为“解头”或“解首”。然后参加中央举行的全国考试，考中者一律称为进士出身，其中的第一名称“状头”。唐代又把各种“制科”考试的第一名称为“敕头”。例如唐宪宗元和九年的“状头”张又新，之前是京兆府“解头”，到了元和十二年，又应博学宏词科得第一名，一时被人们称为“张三头”。在唐代，科举取士中三级考试制度已经基本完善，以后宋、元、明、清都是沿袭着一套制度来执行的。从这个意义上说，这“三头”之说尽管文字上与“三元”略有差异，但实质上大体一致，“连中三头”可以算作是“连中三元”的早期雏形。

“连中三元”背魁星点斗铜花钱

宋代以后就出现真正意义上的“三元”了。读书人首先要在县、府参加考试，被录取者称为“生员”，俗称“秀才”。只有取得“秀才”称号，才可以参加以后的正式考试。正式考试也大致分三级，只是名称有所变化。首先是乡试，每三年在省府举行一次，考中的叫“举人”。吴敬梓笔下的《范进中举》描写的就是乡试的情形。举人中的第一名称为“解元”。然后是会试，这是礼部主持的考试。会试是在乡试后的次年春天的京城礼部举行。由举人参加，第一名称为“会元”。最后是殿试，是由会试的合格者参加。殿试是最高层次的考试，常由皇帝亲自主持。这一考试形式最早开始于武则天时期，不过多与皇帝临时下诏进行的制科相混。殿试合格者称为“进士”，分为三甲。其中一甲只取三名，第一名称为“状元”，第二名称为“榜眼”，第三名称为“探花”。二三甲分别取若干人。（刘永连）

唐朝人做官要经过哪些程序?

唐代科举考试已经初步分为三级考试制度。首先要参加每年秋季府州主持的“乡试”，合格后才可能参加中央尚书省举行的省试。省试之前，先由地方长官于每年农历十一月把乡试录取名单报送尚书省，审核无误，办好证明。省试最初由尚书省吏部主持，唐玄宗开元二十四年移至礼部举行。每年暮春农历三月，省试在礼部贡院举行，因此被称为“春闱”、“礼闱”。省试分明经、进士等科，考试一直到夜深三只蜡烛燃尽才结束。

“省试”是科举考试的核心环节，这次考试影响面大，也最受社会关注。就其考试程序而言，明经科考试先考帖经，再考墨义，最后考时务策。进士科在考帖经和墨义之后，还要加试时务策和杂文（指诗、赋而言）。从其录取情况来看，明经及第大概为十分之一二，进士及第只有百分之一二。当时人们用“三十老明经，五十少进士”来形容两者的难易程度。

省试考过后，主考官要把名单送到中书门下省宰相审定，然后才正式在礼部贡院前唱名并放榜。

不过，如果要做官，省试合格的士子们还要到吏部参加最后一次的选官考试，称为“吏部试”，合格者才能授予官职。至此，一条“学而优则仕”的道路就算走到了终点。（刘永连）

23“同年”就是同龄人吗？唐代的“同年”跟年龄无关，指的是科举考试中同榜录取的人，他们之间互称同年。唐代称同中进士的人为同年，明清乡试、会试同榜登科者都称同年。顾炎武《生员论》有“同榜之士，谓之同年”，类似今天的同学。

科举制是隋以后设科考试选拔官吏的制度，由于分科取士而得名。隋炀帝时开始设置进士科。唐代除进士科之外，又设置了秀才、明法、明书、明算等科，又有一史、三史、开元礼、童子、道举等科。武则天亲自举行殿试，并且增设了武举。各科之中，明经、进士两科成为唐代常科的主要科目，而其中进士科最为重要。唐高宗以后进士科尤其为当时人所重视，唐朝许多宰相大多是进士出身。

22“连中三元”是哪“三元”？(2)

进士及第后，新科进士要凑钱举行庆贺活动，集体到杏园参加宴会，叫探花宴。还要选出两名少年俊秀的进士为探花使，在长安各大名园采摘各种名花，装点宴会。宴会以后，这些“同年”们还要同到慈恩寺的大雁塔下题名以显其荣耀，所以又把中进士称为“雁塔题名”。唐代诗人孟郊曾作《登科后》诗：“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李晓敏）

及第的举子和考官之间是如何相互称呼的?

唐代科举常科考试最初由吏部考功员外郎主持，后改由礼部侍郎主持，称“权知贡举”。唐代省试一般都由礼部侍郎主持。公元689年，武则天亲自策问举人，这是由皇帝亲自主持省试，开了殿试的先河。中唐以后有时在长安洛阳两地同时举行省试，这时的主考官被称为“知两都”。对于及第的举子来说，主考官叫做“座主”、“座师”，被录取的考生便是考官的“门生”，还有“天子门生”的说法。宋太祖正式建立了殿试制度，即在吏部考试后，皇帝在殿廷之上主持最高一级的考试，决定录取的名单和名次。所有及第的人于是都成了“天子门生”。

门生一词可谓由来已久。东汉魏晋时期，想要进入仕途，主要通过察举、征辟，需要官僚举荐，所以一大批人为了追求功名利禄，投靠以儒学起家的官僚门下，充当门生，这种现象促进了门阀大族的形成和发展。门生与主人之间的关系非常紧密，为主人奔走服役，以君臣父子之礼事宗师举主，主子死了要服三年之丧，并继续侍奉其后人，形成一种世袭的臣属关系。

门生的含义到隋唐时期有了变化，科举考试中读书人如果考中举人或进士，就要拜本科的主考官为座主。而座主则称这些弟子为门生。虽然仍有投靠援引的含意，但是已不再是依附关系。而后世的门生，主要是指学术上的师承关系。

座主的称呼源于老师，但比老师更受尊重。因为座主兼有老师和仕途领路人的双重身份。座主一般都是朝中重臣，他们一旦掌握大权，便会提携重用自己的门生。门生对座主除了师生之间的道义，也含蕴了一些功利的因素。所以座主在门生心目中的地位是非常重要的。

科举制通过考试的方式将优秀的人才都吸纳到官僚体系中来，使大部分的读书人连接在了朝廷的战车上，让他们围着科考的指挥棒转，等于是围着中央政府在转。“太宗皇帝真长策，赚得英雄尽白头”，说的就是这个意思。而这其中门生和座主的关系也起着很重要的作用。（李晓敏）

24 唐代的秀才和进士哪一个更难考?

“秀才”一词原来的意思是指“才之秀者”，也就是才能秀异之士。在汉魏两晋南北朝时期，“秀才”成为荐举人才的科目之一。唐初，科举考试的科目繁多。在常科所设的科目中，主要有“秀才”、“明经”、“进士”、“明法”、“明书”和“明算”等。其中“秀才科”被列在首位，是唐代科举的重要科目之一。不过这个科目存在的时间不长，到唐高宗永徽二年就被废止了。后来唐玄宗、唐代宗统治时期曾经有过几次短暂的恢复，但几乎都是昙花一现。

宋人绘制的科举考试图虽然秀才科存在的时间很短，但是在唐代的科举当中，秀才科的取士最为严格。据《唐六典》记载：“其秀才，试方略策五条：文理俱高者为上上；文高理平、理高文平者为上中；文理俱平为上下；文理粗通为中上；文劣理滞为不第。”也就是说，秀才科只有一个考试项目，就是“方略策”五条。所谓的方略策，主要是论述圣贤治道、古今理体之类。要做好方略策，既要有博精的学识，又要有明晰的思辨；既要文采可观，又要理义精当，对于学子们而言，这是很难做到的。《唐六典》注中就说“此条取人稍峻，自贞观后遂绝”。事实上，从唐高祖武德年间到唐高宗永徽年间，每年考中秀才科的不过一两个人，可见秀才科之难考。

与如此难考的秀才科相比，唐代的进士科更受学子们的青睐。唐代人封演在《封氏闻见记》中说道：“国初，明经取通两经，先帖文，乃按章疏试墨策十道。秀才试方略策三道。进士试时务策五道。考功员外职当考试。其后举人惮于方略之科，为秀才者殆绝，而多趋明经、进士。”可以看出，虽然秀才和进士科都是考学子们的策论，但是秀才科的方略策比起进士科的时务策要难多了。

当然，秀才科虽然难考，但是一旦考中，地位也是极为崇高的。据《新唐书》志第三十四记载：“秀才上上第正八品上，上中第正八品下，上下第从八品上，中上第从八品下，明经上上第从八品下，上中

第正九品上，上下第正九品下，中上第从九品下，进士、明法甲第从九品上，乙第从九品下。”也就是说，考中秀才科的人所获得的官职品阶要比考中进士的高很多。（王晓丽）

唐代为什么会有“三十老明经，五十少进士”的说法呢?

除了取人极少的秀才科之外，在唐代的其他科举考试科目中，明经和进士科是最受重视的科目了。而这两者相比较，进士科又比明经科难考得多。

首先，从考试内容上来看，明经科的考试内容主要包括帖经和墨义。帖经一般是摘录经书的一句并遮去几个字，让考生填充缺掉的部分；墨义则是关于经书文章的问答。这两个部分考的大都是考生的背诵功夫，只要熟读经传及其注释，一般都能通过考试。进士科的考试内容虽然也有帖经，但主要的却是要求考生就指定的题目创作诗、赋，或者是时务策。这就要求考生有相当的文学功底，并能够充分发挥自己的个人能力，对于当时的学子们来说，这是很不容易的。正如封演《封氏闻见记》中所说：“（进士）策问五道，旧例，三通为时务策，一通为商，一通为征事。近者商略之中，或有异同，大抵非精博通赡之才难以应乎兹选矣。”

其次，就每年考中的人数来看，进士科也比明经科难考得多。据《通典·选举三》记载：“其进士大抵千人，得第者百一二，明经倍之，得第者十一二。”也就是说，进士科每年应举的人数很多，大概在一千人左右，但是能够被录取的人很少，不过一二十人，而明经科的录取比例则要高出进士科十倍之多。

由于明经科的考试内容简单，录取人数较多，因此比较容易考取，经由明经科入仕的年龄也就偏低，如果三十岁考中明经，就会被人耻笑为“老明经”了；而进士科相对来说比较难考，再加上应举的人多，录取的人数较少，大多数应考的人是终身不第的，所以就算五十岁能考中进士也还算年轻，可以被称为“少进士”。这也就是唐代人所谓“三十老明经，五十少进士”的由来。（王晓丽）